

第 1 章

全球化的形貌

壹、全球化的爭辯

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紀人類面對苦難和希望時會朗朗上口的流行標語(Giddens, 1999; Gilpin, 2000; Held and McGrew, 2000; Nye and Donahue, 2000)^❶。全球化通常被理解成國家與社群在經濟、政治、社會上的整合, 在垂直與水平兩個方面上互相依賴成緊密的網絡。全球化是一個過程而不是質變的最後階段, 在此階段中政治與國家變成是多餘的, 而由市場取代一切。現今國家垂直與水平的整合入全球經濟, 發生在至少兩個可見且可測量的過程中: 外資的快速流通、貿易, 以及政治民主理念和市場原則以現代歷史從未見的規模傳佈開來。關於「全球化是否是值得期待」這種爭辯分成兩派: 一派人視這股趨勢為相互的助益, 另一派人則將之視為所謂國際資本力量的深化剝削, 例證便是全球的跨國企業公司。大部份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以及多數國際組織, 像是國際貨幣基

❶: 關於此辯論最佳的綜覽, 參見 Gilpin (2000)、Held and McGrew (2000) 以及 Nye and Donahue (2000)。關於美國與北美貿易效益的經濟分析, 參見 Burtless et al. (1998)。對全球化好處持懷疑看法的經濟學者, 參見 Rodrik (1997)。關於全球化對國家與民主的影響, 參見 Armijo (1999) and Sakamoto (1994)。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 四校稿, 2005-11-15)

金, 世界銀行以及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CTAD), 普遍來講都偏好國際整合的理念(UNCTAD, 1998; UNDP, 1999)。

然而在公開的辯論中全球化經常被形容為強者(富國的跨國公司)對弱者(低度開發國家)的剝削。這種過程不可避免的會導致社會失序和衝突^②。今天, 大部份的開發中國家都歡迎外資並且極願意對國際貿易體系開放。這與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是個清楚的對比, 當時許多國家實施進口補貼政策並且形成一個由七十七國結合而成的堅實集團, 他們要求建立一套「國際經濟新秩序」(NIEO)來取代一個帶有偏見的國際資本主義體系, 此體系很顯然的具有剝削性質, 並且根據其邏輯, 使得窮國無法翻身(Krasner, 1985; Bhagwati, 1999; Birdsall and Lawrence, 1999)^③。

對全球化的討論也已經超越學術領域了。當我們目睹了
8 在西雅圖、布拉格、哥騰堡、熱那亞和其他地方的暴力示威活動之後可得知, 反全球化力量已經激化成街頭運動。如同「徵金融交易稅救助公民聯合會」(ATTAC)的活動就致力於挑戰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擴散。對抗全球化的聯盟是由一些不太可能結合的夥伴所組成。這裡面包括美國民粹政客如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和裴洛(Ross Perot)的支持者, 他們希望看到美國不再參與多國條例組織以及倡導廢除聯合國體系、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 團結起來的勞工則專注於保護國內市場及工作; 第三世界的支持者則致力於反對隱藏在不平等貿

②: 最為人所知對全球化的抨擊, 參見 Martin and Schumann (1997)的著作。其他批判的言論, 參見 Rodrik (1997)、Gray (1999)、Mittelman (2000)。

③: 參見 Bhagwati (1999)以及 Birdsall and Lawrence (1999)對貧窮國家內關於自由化的政策改變的討論。Krasner (1985)提供一項七七集團(Group of 77)的演進分析以及大部份貧窮國家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對自由經濟法則的敵視狀況。

易背後的霸權擴張；環保激進份子為潔淨的環境奮鬥；還有無政府主義者也參與其中(Micklethwait and Wooldridge, 2000)。由於反全球化成員似乎來自社會上不同社區利益的組成，富裕國家的政府有時也被迫責怪全球化及其造成的經濟錯誤。例如歐盟委員會便責怪全球化導致歐洲的失業問題加劇(Krugman and Venables, 1995)。由英國政府發表的一份關於全球化議題的白皮書引起了各界對全球化的「人性面向」的關切(DFID, 2000)。然而其他人則主張全球化已經造福窮人了。如著名的經濟學家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以及其他人認為，西雅圖及其之後的喧囂抗議已經使得決策作成朝向因地制宜，有能力的政府都試著去平衡國內的疑慮以及履行對自由貿易的承諾，而不再一味堅持全球性開放及公平市場的競爭(Bhagwati, 1999)。

市面上有成堆關於全球化的書。大部分的書是新聞報導或傳聞軼事。所有的混亂及爭辯都濃縮在流行的渾名中，傳來傳去，諸如全球蠢話(global-babble)、地球化(globaloney，譯者按：亦即全球化)以及反全球化(globaldegook，譯者按：一種陰謀論的概念來反抗全球化與資本家)。環繞在定義及詞彙上的混亂更多，以致於很難去評估顯現的後果並形塑最佳政策。少部份的學者試著更系統性的去綜合論點，但是他們的聲音在跨國的抗議聲中很難被聽見^④。宰制戰後時代的兩極超強體系崩潰之後，全球繁榮及和平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繫於全球化過程的平順與適時經營(Gilpin, 2000)。許多人主張，一個自由的世界秩序需要建立組織來穩定和保衛國際經濟合作，並且築成堡壘來對抗反動的潮流，如同兩次大戰之間，許多國家豎起價格障礙來緩衝國內受戰後經濟波動無常的傷害。這畢竟是布

^④：例如參見 Väyrynen (1999)。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 四校稿, 2005-11-15)

列敦森林體制在二次大戰後建立起來的主要基石, 並且形塑了西方強權及其聯盟的基本共識。

9 冷戰結束之後, 開發中國家來到了選擇發展和政治變遷的分叉路口。如何改善佔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他們大部份住在發展中國家且每天只靠少於一美元的生活度日(估計有十三億人口)〕的未來, 已經取代軍備競賽成為當前世界最重要的課題了(Boutros-Ghali, 1995)。部份前第三世界國家在提高所得、建立良好的政府和創造社會和諧等方面做得相當好, 然而許多其他國家則深陷暴力與失序當中, 原因是政府缺乏能力及無法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許多失敗且擺盪在邊陲的社會都曾經親眼目睹幾個世紀以來生活水準的降低。雖然「全球化」一詞相當的新, 不過關於全球結構及組織是否對窮國有益或者其實是在剝削他們的爭辯, 則是數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研究討論發展問題的核心。

發展及低度發展議題的討論通常置於現代化及依賴理論的架構之下, 這些討論也反映在當今全球化的辯論上。新自由主義者、現代化理論者將更密切的國際經濟接觸視為有益於窮國, 而新馬克思主義者及依賴理論者(他們更常被稱作結構主義者或世界體系理論者)則視如此的接觸為新殖民化過程的延續。他們訴諸帝國主義的結構理論和不平等交換理論, 認為強國與弱國之間的國際接觸會對窮國造成相反的政治經濟後果^⑤。他們特別地強調外資和貿易是國際資本主義對發展中社會剝削的形式, 而大規模的接觸會延續窮困並導致開發中國家內的社會失序與衝突^⑥。

^⑤: 參見 Hoogvelt (2001)對不同依賴與現代化角度的綜合分析。

^⑥: 新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仍然由許多人繼續發揚光大, 例如 Amin (1990)、Hettne (1995)、Falk (1999)、Mittelman (2000)、Hoogvelt (2001)。

與之相反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者則歸罪於政府在國內的不當治理以及國家計畫型統籌的經濟政策,因其規避全球化的力量而造成低度發展的後果。他們認為破壞國內和國際市場不讓其正常運作是低度開發的罪魁禍首。這些理論主張全球化可以避免狹隘的利益者主宰市場。冷戰時代意識型態對立的降低以及民主制度的廣佈將會改善社會福利,而新增的福利能夠以一種負責任的(假如不是具共識性的)方式再分配。自由主義者認為由極度怪異的團體聯合而成、特別是在富國內部的抗議示威,是另外一種政治所動員的活動來保護既得利益,並不是為了真正有需要的人。他們疾呼政治人物應避免迎合既得利益並且堅持自由的市場競爭,如此才能造福所有人。

當我在評估和檢驗關於反對與贊成全球化的益處的主要理論假設時,我特別聚焦在關於全球化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的討論。我並不想忽略全球化對富國工人的效應,這個主題在許多文獻中大量廣泛的被討論過(Rodrik, 1997; Williamson, 1997; Burtless *et al.*, 1998)。不過我主要的關切在於開發中國家 10 貧窮及治理危機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我們而言愈發重要,無論我們身在何方。暴力衝突、疾病、國家分崩離析、環境每況愈下或者無法控制的人類遷徙,所有這些現象波及世界最遠角落的日常生活。這些問題似乎並不存在於那些位於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這些國家實施開放經濟,有著很高的貿易依存度,並且持續吸引著全世界的外資,不過在沒有更仔細的檢視經驗證據時實在不能判定大量的外國投資有益於貧窮國家。

對全球人民和政府最重要的挑戰是清楚的區分全球化的願景和危機並且形塑必要的政策來達到最佳結果。這項工作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四校稿，2005-11-15)

將會變得非常困難，因為存在著不協調的抗議聲浪，不過現在這些難題已經變得較數世紀以前更容易克服，因為在過去，意識型態扮演著分化的角色。二十世紀的歷史是一個存在著前所未見的進展和許多的頓挫的歷史，不過一個世紀以前超級兩強軍備競賽與極度敵對的相對和平收場則顯示了人類組織的重要性以及人類有能力在新臨的世紀中進行積極有裨益的活動。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形貌勢必由全球化的相關事物及衍生後果來塑造。

貳、全球化的進展

何謂全球化以及如何去評估其後果是很受爭論的議題。根據科歐漢與奈伊(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2000)的看法，在人類歷史中「遠方」的意義時增時減。不同人們的接觸依其在社會領域內(從政治到病菌都會影響社會)必然的現象層次而有所不同(Koehane and Nye, 2000)。現今的經濟自由化則處於漲潮的階段。我同意科歐漢和奈伊的看法，瞭解全球化浪潮的最佳方法是評估它的「積累」。歐洲和中國經由絲路連接起來，這條通路主要由貿易商所往返經營，將十分具文化滲透性的事物如麵條和火藥從中國傳入歐洲。然而現今的全球化浪潮更具有份量，因為不同的議題幾乎無時差的橫跨全球為人所知，電視的圖像和即時的通訊，移民後果的相對快速顯現，財政危機、戰爭、人權以及環境議題是跨越國際的浮現出來。

現今的全球化浪潮是很清楚的被高度可見及可測量的經

濟發展所驅動, 像是貿易的成長和外資的快速流動(Milner and Keohane, 1996; Bordo *et al.*, 1999)。民主制度的廣佈和對市場經濟的意識型態的擁護也是普遍可見的。目前較難持平去評估的一個全球化新要素是: 透過電子通訊所形成的虛擬社群。運輸成本的大幅降低和電子的發展意謂著通訊傳播將地球縮小了。現今市場上存在的可能性是太大的跟以前有所不同(即便不是所有都實現了), 過去是貨物在絲路上運送或是十九世紀帝國時期由蒸汽引擎來推動全球經濟活動。今天, 我們活在一個真正的全球時代。我首先將討論經濟整合的擴張然後是民主體系的擴展。

現今全球化的浪潮是何時開始的? 在政治領域中, 自由化的趨勢可追溯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Huntington, 1991)。假如我們將經濟自由化視為關鍵, 則轉捩點應落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期, 此時更大規模的取消管制開始在美國卡特(Jimmy Carter)總統任內並且在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時期更加強化(Henderson, 2000)。英國則是在柴契爾(Thatcher)夫人於一九七九年贏得勝選之後擁抱自由經濟政策, 接著, 法國(從一九八二年起)、澳洲(從一九八三年起)、加拿大和紐西蘭(兩者從一九八四年起)都引進了自由化。更令人驚訝的是, 中國在一九七八年也開始「向資本主義靠攏」, 其後一些第三世界小國也起而仿效, 更明顯的是印度也在一九九一年加入行列。

對東歐和蘇聯而言, 一九八四年柏林圍牆倒塌標示著一個轉捩點。不過世界政治的轉變是早於此刻的, 亦即所謂的「寧靜的巨變」(Mueller, 1995)。有人宣告此一改變是「歷史的終結」(Fukuyama, 1991)。其他人則視全球化的主要驅力為「距離的死亡」(Cairncross, 2001), 其來自一九七〇年代後期產生的資訊與通訊技術的革命。部份的人將此時期發生的事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 四校稿, 2005-11-15)

詮釋為因為體認到現代計畫的失敗而產生的文化轉移, 此種計畫嘗試發展由上而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社會。發展必須夠緩夠溫和才能具有合法性, 不然就不能視之為發展(Sen, 1999)。起初國家將其國內經濟自由化, 但最後這對國際經濟也會產生影響。關於此點, 最顯著的進程便是一九八六年歐盟決定成立單一市場, 東南亞國家聯盟(最初成立於一九六七年)的擴張, 區域組織的勃興像是北美貿易自由協定、南美共同市場條約(Mercosur)、亞太經合會議等等, 以及關稅貿易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再度成為管理自由貿易體制的國際機構。經濟的交流並不只包含貨品和金錢的流通, 也連帶包括勞力的流動。

參、貿易

- 12 靠向資本主義也就是「向自由貿易靠攏」(Rodrik, 1998)。貿易型態的整合當然不是一種新現象。十九世紀末期時許多歐洲國家的貿易已經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阿列希納(Alberto Alesina)和他的研究伙伴呈現出九個歐洲國家長時間的資料數據, 平均的貿易依存度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都相當的穩定, 只有在大蕭條和戰時才掉下來並維持下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又極快速地上升到一九三〇年前的水準, 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早期又再度開始成長(Alesina *et al.*, 2000)
- ⑦。當然, 在此同時國內生產總值大幅的增加, 而貿易的絕

⑦: 參見其他資料來源, 例如 Russett and Oneal (2000)呈現了一八八五年之後一段長期的穩定衰退, 期間幾乎沒有全球化的跡象。然而, 他們所得

對價值更是成長不少。

製造業以及半成品的貿易成長很明顯地超過總體貿易(Bordo *et al.*, 1999)。而兩波之間的決策環境也有顯著的差異(Baldwin and Martin, 1999)。十九世紀那一波的全球化是隨著帝國的政治控制而來的,因此國際貿易通常意謂著強國之間的交易,成員寥寥可數。至少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參與全球貿易體系的成員暴增而且當我們去評估全球化的結果時,獨立的主權民族國家其政治環境也有質上的進展。更甚者,要正確的比較全球化的程度也許是與現今不完美的整合的狀況來比而不是與十九世紀來比較(Frankel, 2000)。貨物和資金的流通依舊受制於外顯和暗藏的障礙,而勞力的自由流通仍然十分受限。國家疆界在其他方面依舊十分重要。一些美國和加拿大(兩國有著悠久的自由貿易歷史)的研究顯示,儘管地緣上是如此的接近,兩國人在自家內的貿易還是較跨疆界來的容易。尤其,我們估計一九六至一九九年的地區平均值發現不同區域內的貿易依存度比例存在著極大的不均衡。圖 1.1 顯示所有區域在貿易依存度上都有增加,但是東亞和東南亞則較其他更大幅度的成長,特別是與低收入的國家以及非洲下撒哈拉區域相比較^⑧。

出來的數據是基於任何可得年份內的任何貿易資料,並且極容易受新國家成立的影響。他們兩人即指出,在世界貨幣基金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立以前,貿易的資訊很少被報導。

⑧: 低所得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有著相似的平均貿易依存度,這當然不意味著國際貿易對富國不重要。這個結果純粹表示富國有著極大的國內市場(GDP),而導致貿易依存度的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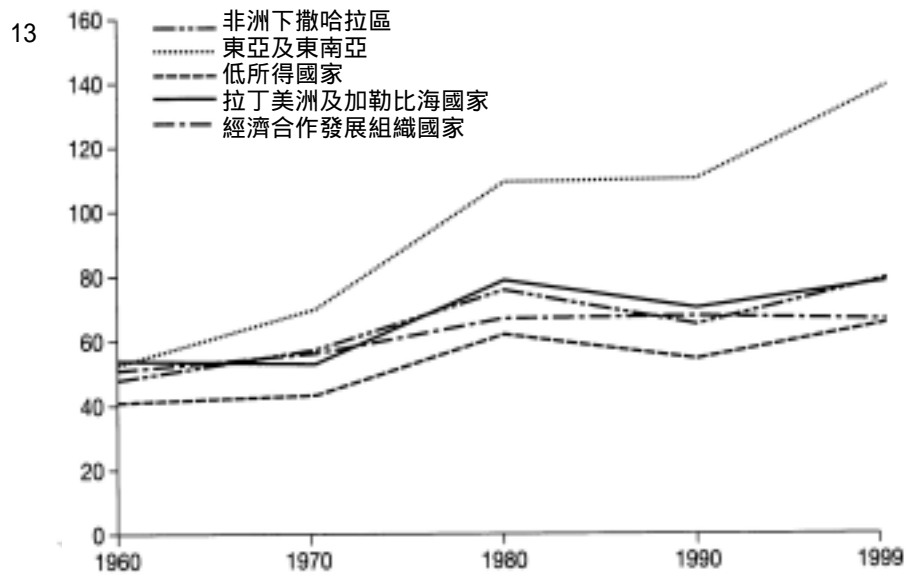


圖 1.1：1960-1999 年世界不同區域的貿易依存度比例〔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 2001)〕

肆、外國直接投資的成長

雖然長時期以來貿易一直很重要，不過今日金融全球化的規模較十九世紀那一波的全球化更深更遠。現在外資佔全球產出的三分之一，佔商業技術效能的四分之三，並約佔全球貿易的四分之三(Dunning, 1992)。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間外資成長了四倍，平均每年成長百分之十五(UNCTAD, 2000; World Bank, 2001)^⑨。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九〇年之間外資更是史無前例的每年成長百分之二十七，比出口成長快三倍並且較全球產出快四倍。事實上，一九八〇年代可看到聯合國

^⑨：除非有特別說明出處，本節所有的數據是源於 UNCTAD (2000)與 World Bank (2000)，並且基於本人應用這些資料的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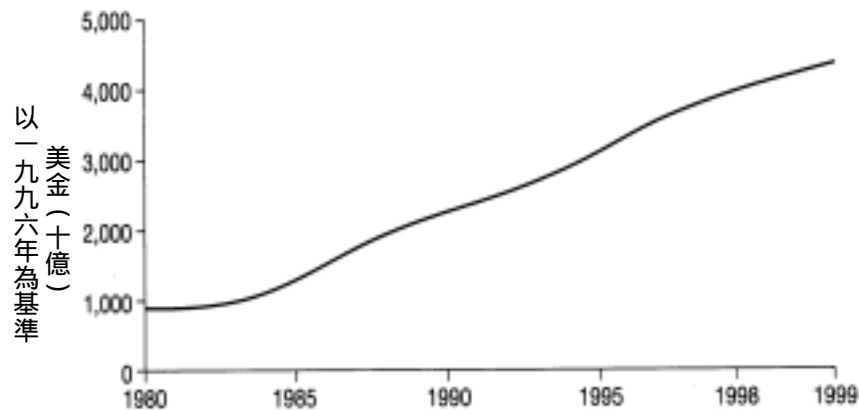


圖 1.2 : 1980-1999 年全球外資總量(個數: 127 個國家) [資料來源: UNCTAD (2001)]

貿易暨發展委員會所謂的外資流動趨勢的暴增, 不過一九八年代的成長速度還是不及一九九〇年代(UNCTAD)。在一九九〇年, 全球外資的總數從不到兩兆美金的一半成長到兩兆美金。到了一九九九年, 才不過四年的時間, 外資的總數已經加倍而達到四兆四千億美金(參見圖 1.2)。

外資的全球地理分佈仍然十分不均衡。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〇年之間百分之八十三的外資都流向已開發國家。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及英國在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之間就獲得了百分之五十六的全球外資(UNCTAD, 1994)。在一九六〇年, 百分之四十八的外資來自美國。到了一九九〇年美國來的外資佔全球比例已經縮減至百分之二十六, 而日本則成為主要的資金輸出國。在一九九〇年全球外資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九都存在於二十個已開發國家中。到了一九九九年, 這個比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九, 因為中國就佔了七個百分比。整個非洲由於受限於自然資源貧乏只佔全球總量的百分之二。就外國投資而言, 全球化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甚至有證據顯示特定區域在貿易與外資依存度方面更退步(更不全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 四校稿, 2005-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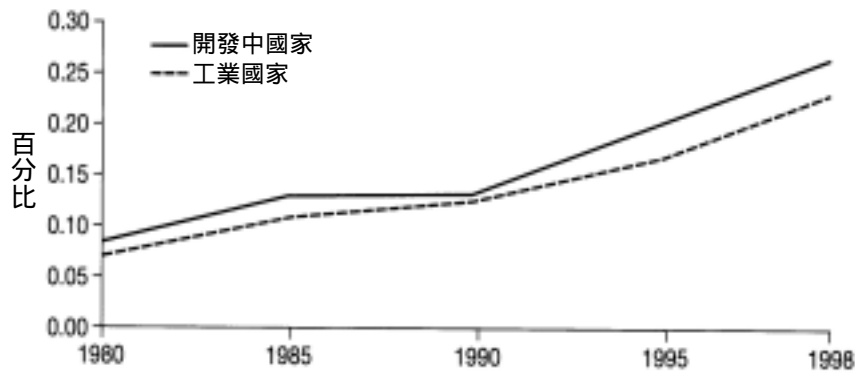


圖 1.3：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外資依存度。Y 軸為外資依存度之百分比

球化)了¹⁰。對許多開發中國家而言問題在於如何吸引外資，而不是如何拒絕它。

無論如何，最近的趨勢顯示有更多的投資正流向貧窮國家。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一年間，對低度開發國家的年平均投資率為百分之八，到了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七年間則成長達到百分之十二點四。更甚者，外資依存度(一種經濟國際化的標準測量指標)從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八上升至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十四再成長至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參見圖 1.3)。貿易依存度和外資依存度的關連性從一九八一年的 0.47 增加到一九九一年的 0.58 再上升至一九九七的 0.62。在經濟活動中更高層級的國際資金似乎與逐漸升高層級的國際貿易相關連。部份研究顯示外資是使貿易層次擴大的主因，不過，本來就開放的經濟體似乎更能吸引大量的外資投入(de Melo, 1999)。

以一個二十個富國(主要的資本輸出國)為例的樣本來看，一九八一年的平均外資依存度是百分之八，在一九九

¹⁰：參見 Hoogvelt (2001)有相似的統計和結論。

年是百分之十三，在一九九八年則是百分之二十二。很明顯的，根據此指標來看無論窮國或富國都以相當快的速度國際化(參見圖 1.3)。

國際化的程度在富國跟窮國中現在已經不相上下^①。在富國中，外資是由科技與市場因素所決定。對貧窮國家而言，則決定於政府對外資態度的戲劇性轉變，在過去，政府的態度常是主要的障礙。

伍、民主的增長

我廣泛的定義民主為所人民治理。有許多該如何準確定義民主以及該如何測量民主的建議。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現代自由民主概念，是達爾(Robert Dahl)所謂的多元政治(Dahl, 1971)。多元政治是政治競爭與政治參與的產物。這種說法與凡翰南(Tatu Vanhanen)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民主衡量法相近(Vanhanen, 2000)。在以下的章節中，我將檢驗根據這些民主面向而來的質性觀點之相關性，特別是與經濟成長的關連。政治型態，另一個經常被引用的衡量標準，將民主概念化為組織制度，特別強調行政權力的限制，不過此項標準是十分主觀的。第三種方法首重公民與政治權利，這又跟公民自由和人權有關，因此也受主觀影響(Freedom House, 2002)^②。

民主政府已經存在好一陣子了，但它並不是一直都是時

^①: Lane and Milesi-Ferretti's 估算外部資產與債務發現窮國與富國的外資依存度與我得出的結果大致相同。

^②: 後續我將更仔細的在理論與經驗層次上檢視民主的標準。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 四校稿, 2005-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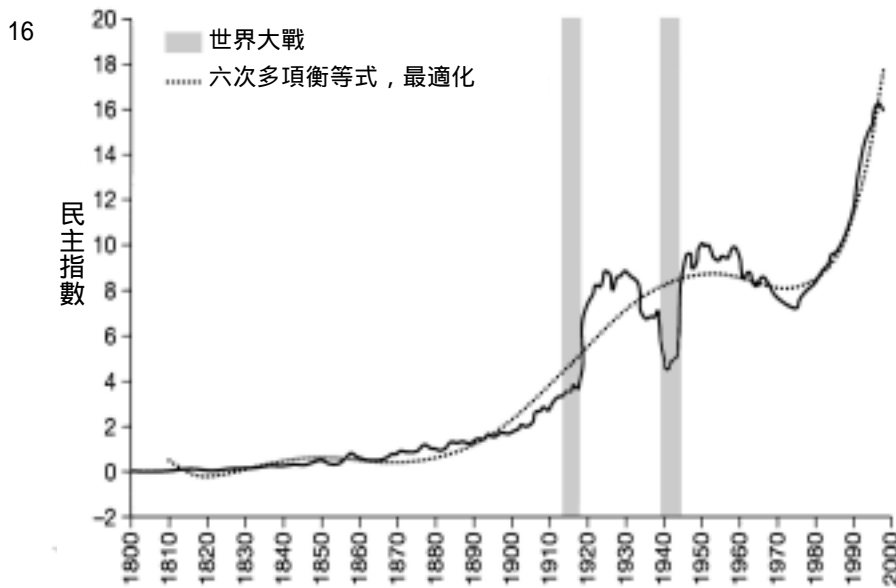


圖 1.4 : 1800-2000 年民主的成長(本圖所標示的年度民主指數是由凡翰南所創, 其曲線的繪製是基於以下資料來源: www.prio.no/jpr/datasets.sap)

尚。杭廷頓區分三波主要的民主化潮流, 並由量化的研究來驗證(Huntington, 1991)。第一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達到高峰, 但緊接著在歐洲興起反民主的極權運動並波及其鄰國。在一九四五年法西斯主義垮台之後接著開始去殖民化, 民主又再度流行起來, 如同圖 1.4 所示¹³。

第二波的民主化很快又遭受阻力, 亦即, 由於共產主義的持續擴大勢力以及許多後殖民民主政體的失敗。直到一九七十年代中期第三波民主化才開始, 起初是南歐軍事政權的式微然後是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垮台的強力推波助瀾。第三波民主化仍持續進行著, 並且將世界帶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境

¹³: 在圖 1.4 中, 我使用凡翰南民主測量法, 其較他人更強調參與, 因之更受公民普選的影響, 而得出一個長期內更戲劇性的增長圖形。無論如何, 用其他測量方法也得出相似的大概輪廓, 如 Vanhanen (2000) 書中的圖 1。

界，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多的國家及如此高比例的人民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儘管在部份國家中出現逆轉的情形加上認為第三波民主即將結束的悲觀呼聲日漸高漲，這股趨勢仍持續下去。

如圖 1.4 所示，第三波民主化的時間幾乎與全球化的蓬勃階段相吻合。在不到一個世紀以前，許多人已經預言民主化的極限，因為他們看到在發展中國家官僚威權主義是與現代化的進展一起成長的(O'Donnell, 1973)。依賴理論學者特別無法去預測貿易投資增長、自由經濟狀態下的轉型。我們可能還未到達「歷史的終結」，因為發展的逆轉是歷史常態，不過此轉型是驚人的。無庸置言的，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長足進展，經濟與政治自由化即屬其中。問題是，我們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中能夠期待什麼？

陸、所得及福祉的增加

一項標準測量發展程度的指標是個人所得增加的速度或是經濟成長率。正統的新古典理論預測窮國的成長平均來說將高於富國，原因是資金的投資報酬遞減，此又稱為梭羅(Solow Model)模型，梭羅(Robert Merton Solow)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預期窮國能在長時間內追趕上富國因為他們有較高的能力吸收資金。不過趨同追趕很有可能會失敗。如圖 1.5 所示，在一九八〇年代與富國比起來窮國的平均成長率是下滑的，所得的差別變大而非趨同。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 四校稿, 2005-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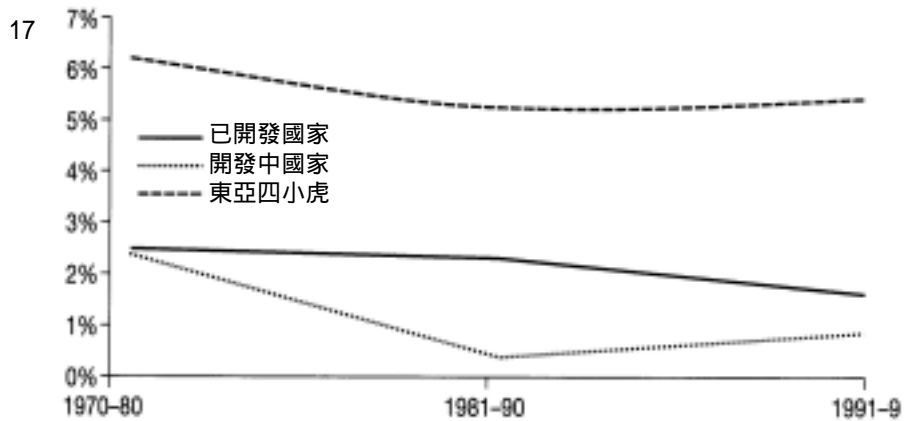


圖 1.5：1970-80，1981-90，1991-99 年不同時期的經濟成長率〔成長率是依個人所得估算，資料來源是 Easterly and Sewadeh (2001)使用世界銀行的最小平方法，細節見資料附錄〕

相反地，東亞小虎國則平均來說維持高成長，雖然至一九八十年代以來有消退現象，在圖形上看來窮國和富國的表現仍有差距，而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則扮演著追趕富國的角色。新發展理論已經摒棄投資報酬率遞減原則，強調人力資本(技術和創意)報酬率的增加，這證明了為何富裕國家的發展不一定會慢下來，而部份貧窮國家也有可能停止成長。在戰後時期，較注重投資人力資源的貧窮國家成長的比富裕國家還要快(Barro, 1991; Temple, 1999)。戰後東亞和東南亞亮眼的成長表現經常被認為是此區域有著高層次人力資源的緣故。另一方面，非洲最近的表現不佳，只有少數令人驚訝的例外(波札納、摩里西斯)。

有許多人反對用平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福利好壞：因為財富可能分佈不平均(成長總是伴隨著逐漸增加的貧窮)；另外也可能以污染和有害工作為代價。聯合國提供了許多另類指標，像是人力發展指標(綜合衡量平均壽命、教育和生活的物質條件)以及進步的程度，例如五歲以下孩童死亡率降低的

速度(UNICEF, 2000)。然而還是有人認為經濟成長與人類福祉並非並行不悖, 不過證據顯示兩者大部份是相輔相成的(Lal and Myint, 1996; Chen and Ravallion, 1998; Dollar and Kraay, 2000)。

當然, 如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言, 光有成長是不夠的, 因為政策的角色很重要。不過增加所得與可資課稅的財富能允許政府實施正確的政策來達成其他目標。很明顯的, 很多國家沒有注意到成長以外的其他因素像是健康和教育, 目標明確的政策能改善健康與教育並進而促進成長, 不過即使立意良善的決策者也必須創造環境, 讓財政手段最後能達到成長以外的目的。最近過多的研究發現經濟成長與人類福祉是極相關的, 他們用社會環境面向來看, 諸如長壽, 教育, 基本需求的獲取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減少(Lal and Myint, 1996; Deininger and Squire, 1997; Chen and Ravallion, 1998; Dollar and Kraay, 2000)。有一項研究下了結論認為「開發中國家經常遭受低成長之苦 通常在總體經濟穩定與重分配正義上面比起中度成長及高度成長的國家更是糟糕」(Naqvi, 1996)。

人民福祉還可以用消費物品來衡量, 依取得物品所需的時間來看。這種比較對測量今日窮人的生活品質來說是正確的, 他們通常被激勵去消費多過其所能負擔的。德龍(Bradford DeLong)在這個議題上提供一項有趣的討論(DeLong, 2000)。生活的物質水準與人類的生產能力在二十世紀中突飛猛進。例如, 在一八九一年平均一個工人一小時工作產出的價值在今天只需數分鐘就能做到。德龍檢視蒙哥馬利·華德公司(Montgomery Ward, 譯者按: 美國第一家郵購公司, 於一八七二年創立, 二〇〇一年聲請破產保護)型錄上不同貨品的價格並將之與時薪比較, 因此可以長期比較獲取貨品所花的相對時間。一輛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 四校稿, 2005-11-15)

腳踏車在一八九五年平均要花去一個工人兩百六十個工作小時, 相較之下在二〇〇〇年只要七點二個小時, 是過去的三十六分之一。一套六大本亞傑(Horatio Alger)的書只花費過去的三十四分之一工時, 一百件的餐具組則是過去的十二分之一, 諸如此類。只有銀器較過去更耗時, 不過現在有不鏽鋼, 所以銀器不再是必需品, 不鏽鋼製成的湯匙則只需花費過去五十分之一的工時! 德龍的分析多是基於美國的資料, 不過這些分析也適用於其他發展中國家, 因為至少自一四〇〇年之後, 這些國家都是「貿易造成的世界」的一份子(Pomeranz and Topik, 1998)。

在反對全球化的訴求中, 常被提起的『不平等』扮演著關鍵角色。而的確, 世界上窮國與富國公民在所得與其他福利上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這是千真萬確的, 無論我們考慮消費、人力發展指標如識字率和健康、生命危險、免於自然及人為災害如戰爭, 飢荒, 和日常暴力等方面的懸殊差別。全球來看, 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富裕國家人民貢獻了百分之八十六的消費支出, 而最窮的百分之二十則僅佔了極少的百分之一點三(UNDP, 1998)。最富裕國家的個人平均所得是最窮國家的一百一十五倍。最常看到的解釋是, 這個貧富的差距是在戰後快速拉大的, 只有極少數中間國家縮小與富國的差距。一九九九年人力資源報告告訴我們「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正在變大」(UNDP, 1999)。許多原本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六〇年代就窮困的國家到今天還是一樣, 在低度開發國家中大多數人民的消費甚至比二十五年前還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來臨的高度成長世紀只嘉惠了特定的國家(Glipin, 1987; Maddison, 1989; Spero, 1990; Olson, 1996)。

縮小貧富國家之間前所未見的差距已然成為最要緊的

事，不僅是因為極端主義藉由恐怖活動激烈地瞄準富裕國家，例如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塔樓遭受攻擊。這種攻擊據稱是出於極端份子對全球貧富差距懸殊的憤怒所致，他們將目標對準不平等的世界體系，這是由西方權力和利益所掌控的(特別是受美國的控制)。

即使蓋達組織真正的動機並非針對現實的不公平，這類活動的普及也受殘酷現實的力量驅使。因此，加速窮國的發展才能阻絕差距的擴大。鼓勵投資，特別是私人投資，如此經濟成長才能解除貧窮，尤其是現在外國援助的規模已經降至歷史新低。冷戰的結束造成援外預算的大幅消減，現今平均只佔捐助國家國民生產毛額的 0.25%，而且還可能不斷在縮減當中(UNDP, 1998)。最大的諷刺在於，當過去導致分配不均的地理政治緊箍咒終於去除而能夠有效率的援助時，現今的援外預算卻大幅縮水。

認為在全球化時期國家間的不平等反而急速增長的這類觀點是極具爭議性的。比較基於所得的購買力評價(PPP)指標，顯示出在一九六五至九七年間不平等反而減少了，亦即使用衡量整個所得分配的範圍(基尼係數)。使用所得資料的研究若沒有考慮價格差異，通常會得出所得不平等擴大的結果。那些使用少部份所得分配資料的研究其結果則視比較什麼而定。在比較前百分之二十最富裕和最窮困的國家時，有些研究顯示出較少的不平等(Melchior *et al.*, 2000)。得出較大不平等結論的研究通常要不是延用未考慮價格差異的資料就是只使用部份所得分配資料(最高/最低的百分之十或甚至最富/最窮國家)。一九六一年之前，世界經濟不平等就已經逐漸增大了。最近的下降趨勢和庫茲聶特(Simon Kuznets)所提出反轉 U 線條相一致(Kuznets, 1996)。當下許多開發中國家正奮力想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 四校稿, 2005-11-15)

20 脫離停滯與貧窮, 我們應可預期他們會在庫茲聶特曲線的上
升部份, 但是我們也可能見到下降的趨勢, 如果所得增加以
及民主持續進展的話(Barro, 1998)。巴羅(Robert Barro)用最新的
資料證實了庫茲聶特的曲線, 而歐魯基(O'Rourke, 2001)認為過
去兩百年來不平等的發展是源自於國家間的不平等, 最近的
趨勢則顯示了差距正在縮小中。

總是有具說服力的證據顯示戰後國家間的不平等特別地
擴大, 尤其是在一九八 至一九九九年間, 許多基尼係數的
激增來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長失敗以及前蘇聯集團內中產
階級的崩解(Milanovic, 2001)。然而, 假若以全球人口做為樣
本, 而不是用民族國家的話, 則會發現不平等是淨下降的,
這是由於中國人所得的急遽增加, 與世界平均所得相比成長
了四倍。更甚者, 中國城市相較於中國鄉村和印度鄉村更快
速地成長, 加上西歐與北美工業國家穩定的成長率造成全球
的不平等。這些周詳研究的發現, 藉著使用家戶調查和購買
力平價(PPP)指標來測量世界所得, 找出成長失敗之處的重要
性。如同我以下要描述的, 貿易和投資在促成救命成長中扮
演關鍵角色, 而良善的總體經濟政策將會對獲致社會和平有
所貢獻, 和平通常受絕對貧窮所威脅。消滅貧窮(現在是世界
銀行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主要政策)應該比降低不平等更具優先
順序。

柒、開放市場與發展

古典經濟學家早知貿易和交換會帶來相互的好處。彌爾

(John Stuart Mill)觀察到「開放外貿 在一個資源尚未開發的國家有時候起得作用像是一場工業革命」(Todaro, 1977)。隨著貨物、資金和技術的流通, 低度開發國家能夠從開放市場獲利。東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奇蹟是巨大獲利的例子, 他們實施出口導向的成長策略常被拿來和失敗的進口替代策略相比較, 特別是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南亞(Gilpin, 1987)。如同一位學者所說, 「貿易, 貿易, 以及更多貿易」讓太平洋岸的國家脫離農村貧困或戰後的凋蔽與衰退而躋身世界經濟強國」(Aikman, 1986)。外資和貿易在東亞新興工業國發展科技能力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例如台灣與南韓(Kuznets, 1966; Amsden, 1988)。

新的證據挑戰結構主義者的觀點, 他們一直認為外資及貿易與窮國作對。理論上, 新自由主義早就認為外資對創造經濟成長具有實質利益。根據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理論, 經濟成長是基於在生產過程中善用土地, 勞力及資本。因為發展中國家通常尚未善用土地及勞力而且儲蓄率太低, 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在這些區域也許可以更高。因此, 新自由主義假設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互相依賴得以使後者蒙利, 因為資金會從富國流向窮國, 而窮國內資金投資的收益會是最高的, 這有助於「後進」社會的轉型。執是, 缺乏資金的發展中國家應該能從資金充裕的工業國家獲得資金輸入。更甚者, 新自由主義者特別強調外國直接投資並透過技術轉移作為成長的引擎。庫茲聶特將西方工業國的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的延伸運用與生產問題關連起來。根據他的看法, 現代社會的基礎是與先進科技的運用複雜的交織著, 而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經常有賴於從富國轉移跨國的知識與科技。

在這層意涵上, 來自富裕國家跨國公司的投資是技術轉

外資、民主與發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 四校稿, 2005-11-15)

移的一個基本機制, 從具有技術的國家移轉到沒有的國家。貧窮的國家並不僅只是接收資金而已, 他們還能受惠於包含在外國資本投資內的技術, 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阻礙了其他形式的資金轉移。因為開發中國家缺乏經營和科技人才來加快發展, 因此外資就成為南-北互動的重要因素, 它有助於經濟成長的發展以及窮國和富國之間差距的縮小。經由資金和技術的流通過程, 開發中國家得以獲致持續的成長, 達到發展的較高階段並且趕上富有國家(Rostow, 1960)。不僅外國直接投資帶來技術, 跨國公司也會轉移一系列現代性企業的制度, 幫助低發展區域中傳統和特殊的社會轉型。事實上, 最近的研究證實外資是轉移技術和知識最有效的工具之一(Dunning and Hamdani, 1997)。這些研究歸結出跨國資金對改善發展中區域的生產力和生活水準是十分具決定性的。

新自由主義也認為開放市場對經濟發展是很重要的。根據他們的看法, 低度開發國家能從此種制度獲益, 因為小市場規模的國家, 如大部份低度開發國家, 能夠接近工業化區域內較大的市場。這個過程可以讓小國開發經濟規模。更甚者, 貿易能夠散佈知識因為它鼓勵邊做邊學。透過不斷的專業分化和參與全球市場最能實現一個經濟體的生產力成長^①。最近關於開放性和快速經濟成長的證據都比不上關於外資的研究發現那般模擬兩可。根據一份被廣泛引用的研究顯示, 要評估影響成長、貿易依存度(開放性)等多變項的力量必須是兩個變項其中之一與成長有著密切的關係, 並且透過投

①: 並非所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都同意這裡所呈現的論點。無論如何, 大部份都同意市場力量以及自由貿易(加上其所倡導的效率)將有益於低度發展國家; 參見 Srinivasan and Baghwati (1999)書中對同意與異議的討論。

資而作用著(Levine and Renelt, 1992)。最近關於貿易對所得的影響的發現又更加清楚了(Baldwin and Seghezza, 1996), 特別是對窮人所得成長的影響(Dollar and Kraay, 2000)。本書剩餘部份的焦點將會放在外國直接投資, 這個議題在強烈反對全球化理念的陣營中, 是十分具爭議性的。這些反對派很少來自經濟學領域但卻主宰著其他社會科學領域, 特別是社會學與政治科學。我將接著陳述對此的憂慮。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 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 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稿版本, 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快。所以, 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排版, 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 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 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 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 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 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 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 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 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 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

韋伯文化

International Ltd